

鲁迅的日本观

许宪国

(株洲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1)

[摘要] 鲁迅本着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留学日本,从情感意义上来说,日本类似于他生活过的北京、上海等地方。面对中日关系,他一方面维护民族的独立,反对侵略;一方面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加强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因此,在处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时,他采取了理性的态度,将政治日本与民族日本分别对待。

[关键词] 鲁迅;日本观;民族情感;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1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3-0118-04

Luxun's Views of Japan

XU Xianguo

(Zhuzhou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Zhuzhou, Hunan 4120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learning western culture in Japan, Lu Xun's attitude towards Japan is as follows: emotionally, he thinks Japan's significance is probably like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he lived. In the face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on one hand, he maintains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opposes aggr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devoted to national exchanges, enhances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s. Therefor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to Japan, he takes a rational attitude, treats separately political and ethnic Japanese.

Key words: Luxun; The views of Japan; national emoti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在中国现代留日作家中,对日本生活明确表达喜好或厌恶之情的是周作人和郁达夫。周作人晚年在回忆自己在东京的留学生活时还重申“是过的颇为愉快的”,“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者警察的欺侮”,“也没有受过大的国际事件的刺激”。^[1]郁达夫则说:“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意第二次再使他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归航》)^[2]而鲁迅在谈到日本留学生活时仅仅说:“日本风景优美,常常怀念”。(《致山本初枝》1933年7月11日)^[3]“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致李秉中》1931年2月18日)^[4]在与高

良富子的会面中也曾谈到留学生活,“怀念起在日本的往事,断断续续谈起在日本的学医生活,千叶田圃里开着的菜花,弟弟周作人曾隐居在千叶县,以及去神田一代逛夜市的情景。”(高良富子《会见鲁迅的前前后后》)^[5]108-109

与周作人和郁达夫相比,鲁迅对留学生活了7年之久的日本,态度要平淡得多。究其原因就在于,鲁迅留学日本,是本着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从情感上来说,日本恐怕如同他生活过的北京、上海等地的意义相似。但处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中日政治关系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在鲁迅的视野中,很难保持单纯的生活之地的意义,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国民性改造的参照物,以及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批判和思考对象,才是鲁

收稿日期: 2013-01-15

作者简介: 许宪国(1973-),男,吉林白山人,株洲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迅日本观的核心部分。

一 日本作为参照系的价值和意义

日本对于鲁迅而言,其价值和意义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异国旅居的生活情感意义,一是参照系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对于鲁迅而言,那个方面对他具有更大的影响呢?

(一)鲁迅的日本生活记忆

日本,作为鲁迅旅居了7年之久的异国,不可能不留下生活的情感和记忆。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也写到:“最幸福的事是在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松树和雪。”^[6]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日本生活对于鲁迅来说,是留下了一定的温馨回忆的,这与周作人、郁达夫等留日作家所表达的有相似之处。

但从许寿裳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平生,极少游玩。他在仙台时,曾和同学游过一次松岛,有许多张海上小岛的松林雪景的照片给我看。在东京伍舍时,有一次我和他同游上野公园看樱花,还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之便而去的。”^[7]从许寿裳的描述来看,鲁迅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日本的旅居生活也似乎没有特别的记忆和留恋,这与鲁迅自己的叙述似乎有些矛盾。

在同一篇文章中,许寿裳说:“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的,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7]¹⁹许寿裳的这段话可以解释鲁迅对日本生活经历的态度,对他而言,日本只是一个生活之地,与杭州、北京等一样并无特殊的含义,吸引如周作人等的“异域情调”,特别是日本的异域风光,对于不喜欢旅游的鲁迅而言并不重要。至于在1934年在与增田涉和山本初枝的通信中曾表示过想去日本小住的想法,^[3]⁵⁸²⁻⁵⁸⁷也仅仅是一种生活的具体安排,并没有“日本情结”的意义。

(二)日本作为参照系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日本期间的生活期间,真正关心并不在日本生活、日本文化,许寿裳后来回忆说:“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他的

病根何在?”^[8]可见,日本对于鲁迅而言,生活经历的情感意义并不重要,日本对于鲁迅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学习的场所、一个国民性改造的参照系。

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从留学日本开始就成为鲁迅生活的重点,放弃仙台学医的生活重返东京,就是因为他觉得国民性问题比之西方科技文化等的学习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国民性改造,是鲁迅一生都致力进行的工作,无论他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还是小说和杂文的创作,都切近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这也使他在面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时,总是联系到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弱点,日本是作为参照系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在他的日本认识之中的。

二 中日关系背景下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立场

鲁迅的杂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他不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而且对现实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批判,以至于给当时国内外读者留下鲁迅对中国现状极为不满和失望的印象。但作为中国人的鲁迅,他同样具有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立场。同时,在面对民族关系时,他又表现出十分理性的态度。

(一)中日关系背景下的民族情感

20世纪初开始,日本逐步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面对这种现状,鲁迅曾说:“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9]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由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鲁迅和郁达夫,“那时鲁迅就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到他的眼里湿润着。他说中国的坏话,正好像父母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儿子:这家伙很蠢,没有办法。原是爱极了的憎恶,别人是没有觉察的。中国的政治家只知道做坏事,使国民受苦,尽管这样,就是有很好的政治,也不愿接受别国的统治。那正跟自己的财产被放荡的儿子所浪费没有办法,可是被别人浪费就不愉快一样——他说过一样意思的话。”^[10]¹⁷⁵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鲁迅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其中一个方面,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是其中另一个重要的方

面。尽管在鲁迅的文章中多见对国民和政府行为的辛辣批评,少见对中日关系的明确表述,但从其面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态度以及行为中,都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情感。

(二)中日关系背景下的民族立场

面对国内社会和政治的混乱,鲁迅给予了强烈的批评,但涉及到民族利益时,他不仅表达了鲜明的民族感情,也表露了明确的民族立场。曾有日本人问他:“贵国的政治、经济都很混乱,国民非常痛苦。如将中国全部交给日本来管,岂不倒可使他们幸福吗?”鲁迅先生听后,立即回答:“那可不行。这在日本看来即使很有利,但对中国却是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5]211}对本国、本民族的批判,并非是厌恶,实际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正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立场。但鲁迅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特别在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背景下,鲁迅能够脱离简单的民族主义的激情,表现出了理性的民族主义的判断力。

(三)理性的民族关系认识

因为中日关系紧张的缘故,鲁迅不得不面对理性的民族主义和中日政治关系的冲突,他对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政治关系是一时的,而民族间的关系却是久远的。他一方面维护民族的独立,反对侵略;一方面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加强民族间的相互理解。

因此,在处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时,他采取了理性的态度,将政治日本与民族日本分别对待。“在国际问题上,他经常发挥着非常宽容的心怀。对于民族间的对立,他采取着超然的态度。”可是,“他却坚决回避对我国国体发生关系。”“他也讨厌同中国政府的交往,同时和日本公务人员的交往他也讨厌。”(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5]74-75}鲁迅乐于和日本人交往,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但他不愿意与日本政府或具有政府色彩的日本人交往,他对交往的日本人分别对待。

增田涉回忆说:“有一次,上海的日文报纸的某记者,因为想会见鲁迅,叫我给介绍,和他商量,他说,在自己的住处有些不方便,还是在内山书店吧。那位记者对于鲁迅不让自己去他的住宅,感到不满。鲁迅说,报社的人因为有政治关系,所做的事,必然泄于外界,所以不在自己的住宅会见他。又一

次,日本一位自然科学家说是希望会见他,一商量,他说因为自然科学家是没有政治关系的,所以可以在家里会见他。”^{[10]177}虽然这只是一个细节,但显示出鲁迅明确的民族与政治的态度,在面对中日民族关系和政治关系时,他保持着理性的态度,避免因中日政治关系而陷入激进民族主义,或者因民族关系而丧失政治立场。

三 对中日两国国家关系的理性思考

从表面上看,鲁迅一直保持与中日政治之间的距离,他发表了很多对国内政治的批评,却很少发表对日本政治的看法。鲁迅并不是不关心中日关系,他对中日政治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对日本的政治行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其中既有对日本的政治野心的认识,也有中日两国国家关系的独立见解。

(一)对日本的政治野心的清醒认识

对于日本的政治野心,鲁迅早在留学期间就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报纸上鼓吹各种侵略中国有理的谬论,而中国的部分留日学生,也有同情日本的倾向。甚至连蔡元培和何闽仙在上海办《俄事警闻》也发表了同情和支持日本的言论。“鲁迅认为:这些人太无远见,他曾对友人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如果沙俄失败,日本独霸东亚,中国必将更受其害。他曾向《俄事警闻》编者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偏袒日本;二、不可用‘同文同种’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提倡对国际时事的认真研究。他托沈颺民把这份意见书交给他们。后来《俄事警闻》采纳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改变。”^[11]

鲁迅认识到近代日本崛起后对亚洲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威胁,他认为中日之间真要保持和平,必须建立在中日实力均衡的基础上。他在同日本友人奥田杏花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认识:“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比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盛的孩子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5]72-73}“中国没有军备,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备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

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12]鲁迅认为国家之间的平等和和平,是建立在实力对等基础上的,离开国家实力均衡的保障,很难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中日之间要实现真正的和平,首先中国要具有与日本保持平衡的实力,不仅仅是军事上,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等方面,这也是鲁迅一直致力于国内政治、文化批评和国民性改造的重要原因。

(二)对中日两国国家关系的认识

在向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日本常用“亚细亚主义”或“同文同种”来麻痹中国人,以达到其目的。对此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批驳:“日本想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在对日本“亚细亚主义”进行揭露的同时,鲁迅也清楚地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进行了区分:“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即使对‘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人民于中国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想法接近。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12]

正因为鲁迅认识到了中日之间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中国自身强大的基础上,所以,他在对日本政治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反观中国自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行批评。他说:“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日本人是敌人不如政府更是敌人。日本方面以为蒋介石是抗日的首领,中国人都认为他是日本人的朋友,日本方面给了他很多好处。中国人如果当奴隶就安心当奴隶;现在的中国连奴隶也当不了,有的只是一片混乱。”^[12]

作为中国现代有留日背景的著名作家,鲁迅在面对中日关系时表现出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那一代留日知识分子的矛盾复杂心态。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除鲁迅外,还包括周作人、郁达夫等。^[13]这一代留学日本的作家,在留学时代既感受着传统老大帝国的衰落带来的弱国子民的哀伤,也感受到明知大正时代日本新兴帝国的朝气,日本的生活经历和通过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使他们一

方面无法完全摆脱留日生活在心理和情感上的影响,或者对日本文化的欣赏带来的文化好感;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的紧张和日本的侵略行为又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民族感情,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在政治日本和文化日本之间寻求一种理性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M]. 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188.
- [2]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3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4-15.
- [3] 鲁迅. 鲁迅全集:卷1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 鲁迅. 鲁迅全集:卷12[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9.
- [5] 史沫特莱,本间久雄,长与善郎,须藤,等.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6] 彭安定. 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1994:604.
- [7] 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M]//许寿裳. 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
- [8] 许寿裳. 回忆鲁迅[M]. 许寿裳. 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10.
- [9] 野口米次郎. 与鲁迅谈话[M]//史沫特莱,本间久雄,长与善郎,须藤,等.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9.
- [10] 增田涉. 鲁迅印象记[M]//史沫特莱,本间久雄,长与善郎,须藤,等.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11] 林志浩. 鲁迅传[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39.
- [12] 圆谷弘. 与鲁迅谈话[J]. 鲁迅研究月刊,1991(5):37-39.
- [13] 许宪国.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29-132.

责任编辑:黄声波